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刘 家 和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不同学术传统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不同看法，这部分也可以说是问题提出的缘由；第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第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第四，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以下让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一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素称史学发达，也有着优良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之所以如此发达，实际上也与其本身的优良传统有关。什么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呢？概括地说，那就是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重视史学的求真。如果我们把中国史学开端追溯到《尚书》，那么就会在其《康诰》、《酒诰》、《召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等篇里发现，周公是如此重视夏、商两代兴亡、成败的历史，以致多次论述到它。很显然，周公反复说这些历史，其目的无疑是要使周人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他是在以史学来经世致用；同样，在以上诸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公对于殷商的先哲王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对于殷商曾是“大邦”、“天邑”而周则为“小邦”的历史事实也是毫无隐讳的，也可以说，他并不因为殷周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放弃了对于史实的求真。当然，我们不能说周公已经自觉地、系统地解决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的关系问题，不过也不能否认，这正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滥觞。以下历代官、私修史，不论其具体结果如何，基本上莫不以求真与致用的结合为其宗旨。例如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是颇重二者结合的一个典

型之作。司马光早就有志“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见光所作进《通志》表。）后来受宋英宗之命修史，神宗又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这完全是一部讲究经世致用之书。可是，他和助手们修这部书时，除引用了各正史以外，还参考了杂史 322 种，可见征引之博；在博引中往往发现前人于一事之记载有所异同，于是又作了《考异》30 卷（今所见胡三省注本已将考异散入有关各条下），可见考证之精。而其精其博，皆在于求史之真。应该说司马光作《通鉴》是在求真与致用两头都作了很大的努力的。这就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优良传统的表现。

我们说兼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优良传统，还可以与古希腊的学术传统来作一些比较的说明。在古希腊，史学家是重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例如，修昔底德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一方面很注重记事之求真，在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人性总是一样的，因而往事在以后某一时期总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所以察往会有益于知来（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 2）。可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却对于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皆没有太高的估价。亚里斯多德在其《诗学》（IX, 2—4）中说，史与诗的区别不在于一为

散文一为韵文,“真正的不同之处是,一种说明已发生的事,另一种说明可能发生的事。因而,诗比史更具有哲学的和严肃的性质。诗有助于提供一般真理,而史只提供特殊的事实。”他认为,在诗中,某种性格的人总是会有某种行为,几乎可以推知;而在史中,某种事实被记录下来,它以后是否还会发生呢?那就难说了。他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都抱这样的存疑态度,显然是受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思想影响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475E—480D)中曾经详细地说明了“知识”与“意见”的区别。如果我们在此不管他的具体论证过程而只述其要点,那就是说,“知识”是对应于存在而生的,“无知”是对应不存在或者无而生的,这是对立的两极;另外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比“知识”暧昧,比“无知”明确)东西,即“意见”,它是对应于变动不居的具体事物而生的。在柏拉图看来,存在就是存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存在。“知识”一旦把握了这种存在,便永远把握了它;知道它的过去,也就准确地知道了它的未来。哲学家所爱好的也就是这种“知识”。按照这样的观点,史学家即使记载了过去历史之真,也未必能保证其在未来亦为真;这样,史学就不能给人以“知识”,而只能给人以“意见”。在柏拉图看来,“意见”倒不是毫无用处,其致命弱点是靠不住。如果依照柏拉图的看法,则史学之求真与致用皆未可必。所以,如果从把握真理的角度来看,古希腊哲学家是以为真理只有从对象的永恒状态中来把握的,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以为真理只有在对象的运动状态中才能把握之。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历来重视史学这一点上,而且,在《易经》和《易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哲学同样是注重从运动中把握真理的。到底哪一种把握真理的途径更为好一些呢?当然应该说从运动中把握真理的思想更高一筹。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注重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有比古希腊人高明的一面,从比较的角度说

这也是中国学术中的一种优良传统。

不过,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中国史学传统之讲求真,一般都是称道“直书”和“实录”。班固说,刘向、扬雄很佩服司马迁的“良史之材”,称赞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说,史学要想求真,史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态度必须忠实、正直,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该写什么还是要写什么;二是必须把历史上的事实考察得既清楚又切实,不留下模糊和错误的记载。以后刘知几作《史通》,其中有《直书》和《曲笔》两篇专讲这个问题,而核心思想仍然不外乎这些。作为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史学家,他们能把上述两个方面当作对于史学的求真的要求,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不过,这样的史学求真毕竟还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不能说其中没有留下任何问题。这一点请待下文再说。而中国史学传统之讲致用,如果说其成就伟大,那么大概还必须补充一句话,即问题也不少。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由致用而变为滥用。自古以来,史学被滥用的事例太多了,只要翻翻《史通》,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许多这一类的例子。就以“文革”中的情况来说,当时“四人帮”把史学滥用到了什么程度,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不须细说了。在中国,有对于史学的滥用,就有对于这种滥用的批评和谴责,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好的学术传统。不过,对于滥用史学的批评,一般都是先指出某文或某书在哪些地方滥用了历史,违背了历史的真象,进而分析其滥用历史的不光彩的动机以至揭露其阴谋之所在。似乎到了这个程度,也就可以认为批判透了,因为已经追究到了问题的政治实质或者阶级实质。不过,史学的经世致用有没有它的一定限度?人们在以史学致用时是否应该有所自律?如果应该,又将何以自律?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一言以蔽之,中国学者在史学的致用与求真的限度方面缺乏深

度的理论思考,这又是我们应该借鉴于希腊人地方。

二

史学既以已往的人类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以论述已往的人类历史进程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它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谬误自然也就取决于它是否通过适当的研究达到了正确论述已往历史进程的目的。追求对于已往历史进程的正确论述,这也就是史学的求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史学求真的良好传统,也有许多关于史学求真的实例。例如,《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太史董狐不畏赵盾的权势而书“赵盾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记齐太史兄弟不惜牺牲生命而直书“崔杼弑其君”,这些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美谈。不过,到底怎么样记载史事就算是求得了历史之真呢?史学求真在方法论上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刘氏此说,如果以最简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史学之真在于无误地反映客观的历史进程或事实。从质的角度而言,史学应为历史之反映,这大体符合所谓的“真理符合说”(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从量的角度而言,史学应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历史,如同好的明镜或好的录音机不会失真一样。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不失真的要求呢?在刘氏看来,那就是要排除主观好恶的影响,或者说要史家保持高度的客观的精神状态。刘知几(661—721年)的史学求真论,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见。它会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德国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年)所主张的著史当“如其本来面目”(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说,以及其所标榜的客观主义。

· 114 ·

显然,不论刘知几还是近代主张客观主义的科学史学派的学者,都有一种近于天真的想法,即只要把史料找齐核实并排除主观的干扰,史学之真便可达到百分之百,亦即“不多不少”正是科学的程度。可是,正是这种以为凭着绝对的客观主义便可以得史学绝对之真的绝对主义的主张,引出了它的对立物——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主张后一种理论的史学家彼尔德嘲讽说,那种纯客观主义的求史学之真,原来不过是一个“高尚的梦”。

应当说,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在其批评史学的绝对客观和绝对真实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一方面,史学既然是人们对于往事的研究和论述,它本身就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因而我们只能要求史学的主观尽可能地符合客观,而不可能要求史学完全排斥主观;因为,完全排斥主观并不足以达到纯客观,相反却使史学的客观也无所依托。某些主张凭藉纯客观主义便可实现史学求真的学者,对于这一点是缺乏认识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真与主观简单地对立起来。某些主张相对主义的历史哲学家以为,史学既离不开主观,其内容也就无所谓客观之真。其实他们和他们所反对的客观主义的史学家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同样地把主观与真简单地对立起来了。其实,主观既可以使人们背离历史进程的真实,又可以使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逼近真实。正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能力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限度以内,所以我们把握历史之真的能力也总是有限度的。作为历史学者很有必要认清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史学之求真就是要其论述符合已往的历史进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要有充分的证据。历史的进程总是涵盖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内容的,而历史的记载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方面和层次,于是史学之求真总会在证据上受到一定方面和层次的限制。所以史学所能反映历史进程之真,总是在一定方面和一定层次上的。

某些主张相对主义的史学家以为这样相对的真便不是真,那显然是错误的。自然科学上的真又何尝不是在一定方面和一定层次上的呢?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清醒地认识到史学之求真总是有限度的,总是在一定的方面和层次上的,这也很有必要。

如果认为只要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并搜集足够的资料便可以完全地反映历史过程之真,像明镜鉴物和虚空传响一样,那么史学就不会有太多的发展余地。因为,一旦史学家的角色变得像反光镜和传声筒一样,那么就成了完全被动的反映的工具,还有什么史学的发展可言?相反,如果清醒地认识到史学的求真总是有其具体的方面和层次的限度的,或者说总是在其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那么,即使在我们对于一个具体的史学领域或问题取得求真的胜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以为史学求真的任务有可能在一时一举告成的。这在实际上只能使我们在求真的过程中避免笼统的观念并从而使逐步深入的求真成为可能。

中国古代的史学在以上这一点上是不甚清楚的。例如,以上所引齐太史之书“崔杼弑其君”与晋太史董狐之书“赵盾弑其君”,从来都被并列为直书实录的典型,可是这两项记录的真实性的不完全一样。按《左传》所记,齐庄公是被崔杼亲自组织并指挥的人杀死的,所以“崔杼弑其君”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记录,其真是叙述之真。而晋灵公是赵穿杀死的,赵盾当时正逃亡在外,并不知其事。董狐说“赵盾弑其君”,是因为赵盾身为正卿,逃亡未出境,返国又未讨弑君之人(赵穿),所以对于这次弑君事件负有罪责。董狐之笔所记并非叙述之真,因为如果直接验证事实,那么所记并非为真;他所记的实际是一种判断,按照当时的政治伦理标准来说,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如果说这样的判断为真,那也只一种定性之真。过去对于这样两种不同的“直书”没有加以具体分析,因而对于求真的

理解也是笼统含糊的。

三

史学可以致用,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所记无非是前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对于后人自然有用。可是,前人的经验是否全对后人有用,或者能有用到何种程度,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史学中就没有太多的深入的探讨了。

司马迁作为一位出色的史学家认识到了历史的古今之变,所以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绳乎?”(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在他看来,古是有用的,用处在于今人可以用它作为镜子来照照自己;不过,汉代已经不同于五帝三王之世,所以也不能一切都照古帝王的样子办。这里面就透露出了一种信息:史学是有用的,不过用处也是有限度的。司马迁的不足之处是未作进一步的分析,当然对于古人,能有如此卓见已属难得,是不应有过度苛求的。

那么,史学之有用性为什么会有其限度呢?我以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史学以已往历史为研究对象,其内容自然为“古”;而以史学致用的服务对象是当代之人,其要求自然不是为了“古”而是为了“今”。因此就有了大家都熟悉的“古为今用”的问题。“古”为什么可以为“今”用?因为“今”是“古”的延续,“今”不能凭空而起,对于“古”必然有所继承;历史不能割断,“古”“今”是相沿而来的。唯其相沿,所以相通,所以可以为用。这一方面的道理大家都很熟悉,不须细说。但是“古”与“今”之间不仅有相沿的关系,而且有相革的关系。“古”不革不足以成“今”。“古”与“今”延续的过程实际是以否定或扬弃的方式实现的。所以,历史的过程中既有其“通”,又有其“变”;非“通”无以见其“变”,非“变”又无以成其“通”。其实这个道理司马迁也都早就说过了。既然有变

有革,“古”与“今”就不是相互雷同,而是有同有异。既然有同有异,古之所无常为今之所有,而古之所有又常为今之所无,那么“古”之可为“今”用者也就不能没有其限度了。

第二,如果说“古”与“今”在客观上的差异是史学的有用性的一方面的原因,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史学研究本身的进行方向与致用于今的进行方向,其间也有着显然的不同。史学作为学术,是以今人研究过去,其进行的方向是回溯的;而经世致用,究其本质,则是今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目的本身是要在未来实现的东西),从而其进行方向是面对未来的。人们常说古为今用,其实这个“今”即“现在”在严格意义上只是其值接近于零的一刹那,当你为这一刹那的“今”致用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这也说明所谓古为今用实际上是为人所用,为今人的某种目标所用,为今人的或短或长的未来所用。由于这种进行方向的差异,史学能以为今用的功能本身就不是直接性的。研究历史就是要弄清和理解过去的事,如果做得好,其直接的效果是使人能够成为“事后诸葛亮”(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有了对于过去的清楚的知识 and 理解,只是有了对于未来产生正确了解的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事后诸葛亮”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多了,就有了可以转化为“诸葛亮”的必要条件,不过究竟能否转化为“诸葛亮”,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所以,史学的致用在这点上也是有其限度的。

人们在讨论史学致用问题的时候,通常总是讲史学有哪些用处,而以上却谈了它的限度问题。其实,这并不是说史学不能或者不要致用,而是说我们在以史学致用的时候要有一种清醒的意识,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误以为史学可以无限地致用或者任意地致用,从而造成史学被滥用的现象。不辨古今之异,以古代的儒法之争讽示当代的斗争,其为对于史学滥用,此为人所共知;其为害于国

家、为害于史学之严重后果,也为人所共知。因此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不注意史学致用的适当限度,其结果正可能走向反面。

如果对于史学致用的本身加以分析,那么还可以发现,史学之用基本上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其一,在有意识致用的层次上,或者说在有用之用的层次上。比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有意识地总结前代在政治上成败得失的经验与教训,以为当时统治者及其后世所用。由于目的明确,其选材标准也明确,所以的确对于宋代以至后代的为政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就其正面效果而言。可是,正由于其目的之明确,《通鉴》本身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司马光在书中大书对君主尽忠守节的人物事迹,到今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样就显出了其有用之用的局限性的一个方面。再从另一方面说,《通鉴》在过去教人们对于君主尽忠守节,其效果比较好,可是对于这样的效果本身又当如何看呢?恐怕也不能一概肯定。这就是其局限性的又一方面。正如黑格尔所说:“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页。)史学致用的目的越明确,其达成致用的方向也就越具体,方向越具体就表明其规定性越强,而规定性即是限定性。所以,史学的有用之用的规定性与限定性是同时存在的,而且规定性愈明则限定性也愈大。

其二,在无意识致用的层次上,或者说在无用之用的层次上。自《书》、《诗》以下,中国历史上有连续而繁富的史籍,它们实际上都各有自己的写作目的或致用目标。那是属于有用之用的层次上的。可是,在那些典籍里也记载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进程。这些过程本身的记录在当时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致用的目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之流的保存中,中国人终于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是中国人。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世

界历史书,其作者当然各有其致用之目的。可是,在他们的明确的意识以外记载了的世界历史文化之流,却往往使读者产生了对于人类文明的理解和感情。总之,史学可以使人爱祖国、爱人类,可以通过与历史人物的对话使读者在素质上有不知不觉的提高。这些都属于无用之用,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大用。所以,史学之致用固然是讲功利的,但是也不必太功利主义了。

四

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如按德国人的说法,就是精神科学, die Geisteswissenschaft),它是今人的精神对于昔人往事(并通过往事对于昔人的精神)的把握,因此它本身是属于精神范畴的。但是,史学作为精神产物,其两“极”却由客观的实际制约着。这就是说,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史学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史学之体在于其为真,而史学之用则在于其为善。无史学内容之真,则史学不复成为史学,亦即史学之体不存;体之不存,则用将焉出?无史学,则何来史学之功用?无史学功能之善,则史学无复价值可言,亦即史学之用不复存;史学之用不存,人将弃史学如敝屣,则史学之体又将焉托以自见?所以,我们可以说,史学作为一种学术,就存在于古今两极(两种实际)的张力之中。

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这种张力下的史学呢?以下试分为两层来探讨。

第一,让我们从逻辑上来作一些探讨。在刚才所说的一段话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史学的致用与史学的求真之间互为条件的问题,现在再稍事展开,作一点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可以试作这样的判断:

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致用。

这就是说史学之求真为其致用之必要条

件。那么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真;无史学之真,则无史学之真之用。因此以上判断能够成立。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史学不须求真也能致用,过去这样致用之例甚多。我们说:不求真的“史学致用”,不是真的史学的致用,而是假史学的致用或史学的滥用。这里的界限必须清楚,驳议不能成立。

我们还可以试作这样的判断:

无史学之致用,即无史学之求真。

这就是说史学之致用为其求真之必要条件。那么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如果史学不能致用,那么它就没有价值,就没有存在的理由;那还会有谁去求其真呢?因此以上判断能够成立。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过去有许多从事历史考证的史学家,他们根本就未曾想到过史学致用的问题,怎么可以说无致用即无史学之求真呢?我们说:史学之致用实际有两个层次:其一层是为社会所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致用;如果打一个比方,这相当于砍柴。其二层是为发展史学自身所用,看来脱离实际的考证家们做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打一个比方,这相当于磨刀。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磨刀虽非砍柴,却间接地为砍柴所用。这里只有间接的致用与直接的致用之分,而无致用与不致用之别,所以驳议也不能成立。

由以上论证可知,史学之求真为其致用之必要条件,则按逻辑,史学之致用当为其求真的充分条件;史学之致用为其求真之必要条件,则按逻辑,史学之求真当为其致用的充分条件。于是,史学之求真与史学之致用互为充分必要条件。我们说,史学存在于求真与致用的张力之中,其逻辑的根据即在于此。如果说,真为史学之体,用为史学之用,那么现在也就可以说,史学可以即用见体,即体见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

第二,让我们再对这种张力中的史学作一些具体的探讨,也可以说是对于以上逻辑

论证的进一步的事实说明和分析。

古今两极对于史学之所以能形成张力,是因为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矛盾又有统一。古变而为今,今非古(区别)而又源于古(联系)。古本身已经不复存在,而其流则展延不绝,以至于今;可以说古已逝而犹存,它存在于传统之中,继续起着作用。这就说明,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古与今之间实际上是有一条无形而有力的链子拉着的,这链子就是历史的链子。唯其在客观上有这样一条链子的存在,人们就不能不对于古有一种回顾与理解的要求。因为不知古便难以确乎知今;不知古之知今,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们为了知今,转而上溯以求知古。这样就在古今之间形成了另一条链子,这也就是史学的链子。在这一条链子上,人们要知古就要求真,这是一个方向的努力;可是,人们又非为了古而求知古,知古对于他们不过是知今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又是另一个方向的努力。史学的链子就是这样被两种方向的力拉得紧紧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对这条史学的链子上的两种力的具体作用作一些分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就其分力或者求真与致用的矛盾方面来说,它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为害的。如果史学的致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超过了史学之真的限度,那么这样的致用就成了滥用。这样的滥用通常可能造成两种危害:其一就是带来消极的、以至破坏性的社会后果,这也就是所谓的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不须再作列举。其二就是给史学带来影响以至破坏性的创伤。这一类的例子也很多,无须再说。总之,史学的致用有一个弹力极限,那就是史学之真;一旦超过这一极限,就会发生致用与求真两极间的链子断裂。这是应该避免的。同样,如果史学求真确实远离了致用,以至连

间接的致用的作用也不具备,那么这样史学是不可能不逐渐萎缩以至失去存在的可能的。这样的事例也是无须列举的。所以,史学的求真也不能脱离了致用的极限。

再则,还可以从求真与致用两极之间的合力或者从二者的统一方面来说,它们又是可以起互相促进的作用的。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历史;不过只是到了文明产生以后,才有了史学。几千年来,史学的发展成绩是可观的。而成绩的取得,则靠着史学致用的推动。直接致用的需求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问题,而间接致用(即致用于史学本身发展)的研究成果则常常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条件。如果说人们的主观有时会造成求真的失误,那么同样是人们的主观(正确的主观努力)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同样,史学求真的发展,又不断为史学的致用开拓出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样才能保证致用的不断发展。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上述的史学的间接致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它从一方面来看,是致用;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又是求真。所以,正确地认识并处理好这种间接性的致用,使它既能联系上史学的直接的致用(致用于社会),又能紧密地联系上求真,这正是史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是史学家的努力所必须注重之点。

最后,我想说,中国人历来重视并相信史学的求真的可能与致用的必要,这个学术传统是很好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史学的真和用的致疑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这种致疑可以使我们想到史学之求真与致用是有其限度的;而注意到了这种限度,就有可能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上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
研究所教授;责任编辑:谢宝耿)